

「這份原稿太過真實」：十八世紀書信寄存的錯置

陳皇華/ Chen, Huang-Hua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摘要】

這篇論文試圖從記憶的角度切入，檢視啟蒙與十八世紀書信體例之間的交纏。透過幾本在十八世紀引領風潮的書信體小說，筆者論證這些小說如何在一方面在內容與形構上力求貼近真實，另一方面所展現出的寫作主體卻又是斷裂與錯置的，似乎是對於理性主體所作出的省思，並藉此分析十八世紀書信體的寄存之間又是如何與這般失了根的、詭異感的、自我遺棄的啟蒙相互影響。

【關鍵詞】

十八世紀、書信體小說、柯麗莎、哈伯瑪斯、李察森、詭異感、記憶

【Abstract】

Jürgen Habermas suggests that with the rise of the epistolary genr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inally feels at ease in the terrain of subjectivity. The study contends, however, that the Enlightenment subjectivity is never self-enclosed but fragmentary at best. Indeed, the sub-texts that one reads in Locke, Rousseau, and Kant reveal that these philosophical minds are constantly baffled by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memory and writing, reason and passion, to name a few. Through the study of eighteenth-century epistolary novels, such as *Clarissa*, *Julie*, and *Evelina*, one can start to see how the demand for authenticity by epistolary writers turns their attentions to the uncanniness of the human subjectivity and its displacement of the functions of memory.

【Keywords】

Epistolary Novels, Uncanny, Habermas, *Clarissa*, Richardson, Memory

「這份原稿太過真實」：十八世紀書信寄存的錯置¹

「打從〔啟蒙〕一開始，對於心理層面的興趣，同時增加在與自身以及與他人的關係上：自我觀察與那另外一個具有情緒起伏的我，形成了有些好奇、有些同情的結合。日記成為了一封寄給寄信人的信，而第一人稱敘述的文章成為寄給另外一個人的自我對話…當盧梭開始使用書信體來撰寫他的《茱麗，或新愛綠綺思》，而歌德開始寫他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時，這樣的雙重性不再有任何的阻礙了。〔十八〕世紀接下來的這段期間，怡然自得的狂歡在世紀初尚稱陌生的個人主體場域裡頭。」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Habermas 49 - 51）

本文藉由李察森（Samuel Richardson）筆下女主人翁柯麗莎（Clarissa）的書信往來，以及她在小說急轉直下之際，所寫出一連串難以理解的斷簡殘篇，來探討十八世紀書信寄存的錯置，以及接踵而至書信記憶的問題。²所謂「寄存」，乃至於「書信寄存的錯置」主要是強調啟蒙的主體性乃是透過書信寄送與存取的過程來達到展延，而中間往往因著書信體例的複雜特性，而產生自我遺忘的可能性。的確，書信做為啟蒙思潮的載體，自然反映出十八世紀中產階級自我覺醒以及打破權威的傾向，所以書信一直以來，總是被認為是內心的真誠反射，以及情感的自然交流，所謂「見信如見人」，也就是這般道理。³但是在這樣對於真誠的要求背後，我們也意識到啟蒙對於書信體的某種焦慮，換言之，當柯麗莎的書信越來越跳脫了女性書信書寫的「殷勤文雅」，甚至於打破書信既有的界限，也等於是暗示了書信所帶來的某種主

¹標題的引文原文是“The original is too much an original”。關於“original”在這裡的意義，筆者斟酌《柯麗莎》的上下文，可以確定樂夫萊斯是指柯麗莎的書信已經超越了書信的本質，某種程度上已經創造出另一種真實性。也因此，李察森藉由書信的錯置，以此指涉女主角的自我遺忘，反而造成了樂夫萊斯的困惑。翻譯成為「本體」或是「原初」似乎也可以表達當下的情形，但或許不免拗口，也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困難。關於這點的討論，可詳見文末討論。

²這篇文章的初稿發表於2012年第三十五屆比較文學會議「寄/記存之間」。感謝會議參與人所提供的改進意見。

³關於中產階級興起、公眾領域的流通、以及書信體之間的關係，可參閱泰瑞·伊果頓（Terry Eagleton）的《The Rape of Clarissa》以及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

體性的踰越（秦曼儀 773）。的確，在《柯麗莎》一書中，書信交流的結果往往是流連在文字的迷宮之中，一旦開啟，就無法收拾，進入「危險關係」之中，甚或模糊了自我與他者、主體與客體的疆界，彷彿對於啟蒙以降的經驗與理性傳統投以質疑的眼光。於是，本文想要揭櫫的問題重點在於：從啟蒙時期的觀點而言，到底是怎麼樣對於書信的認知，讓小說主角樂夫萊斯在看了柯麗莎的書信之後，大嘆「這份原稿太過真實」（“The original is too much an original”）（889）？⁴如果說柯麗莎的片段記憶反而「太過真實」，那在這般的錯置之中，又反映出怎麼樣的啟蒙思維矛盾呢？而當目前文學批評陷入所謂的記憶熱潮，十八世紀對於理性主體的認知，又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樣對於討論記憶的激盪呢？

書信與啟蒙主體之間的關係

書信，乃至於十八世紀書信體小說，作為啟蒙理性的媒介與推手，已是學術界廣泛討論的焦點。⁵正如引言中哈伯瑪斯所說的，具有雙向性的啟蒙理性主體，既是對主體的關注，亦是對他者的好奇；“我”可作為主體，也是我所關懷的客體。對他而言，當啟蒙主體開始進入書寫的世界中，就開始不斷的朝向他者昭示自身的存在，於是不管是日記或是第一人稱敘述的文本，都是嘗試向外發聲的結果。這樣的一種對話形式，便是哈伯瑪斯念茲在茲的啟蒙主體形塑的過程，於是不僅僅在他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一書中，不斷的強調那種我與我之間對話的自我反省的過程（43），在另一本著作《現代性的哲學論述》（*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中，他更是進

⁴雖然討論啟蒙有諸多切入的觀點，限於文章的篇幅，本文著重在啟蒙大家洛克、盧梭、以及康德，並佐以現今探討啟蒙最力的哈伯瑪斯，作為探討啟蒙理性主體的依據。

⁵吳藍（James Howland）在 *Letter Form and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The Epistolary Paradox* 一書中提到，書信體作為理性交流的工具，是啟蒙的最佳載具（41）。而哈伯瑪斯也進一步地以十八世紀的 *Tatler* 雜誌為例，指出書信體擁有使人相互啟蒙的功用（*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42-3）。其他如畢比（Thomas Beebee）以及庫克（Elizabeth Cook）也都有專書研究書信體小說，提到書信對於啟蒙的重要性。而阿姆斯壯（Nancy Armstrong）在提及啟蒙與小說之間的關係，更是直接提到書信寫作直接把潘蜜拉從「被強迫佔有的物品，轉變為可以同意婚姻的自我獨立的個體」（5）。而《潘蜜拉》之後的《潘蜜拉第二部》（*Pamela Part 2*）雖然描寫潘蜜拉婚後回歸家庭體制，不再像第一部裡頭那樣的積極展現其主體性，但在索然無味的婚姻生活中，暗藏的卻是卡索（Terry Castle）在 *Masquerade and Civilization: The Carnavalesque in Eighteenth Century Culture and Fiction* 中所稱的「重複」結構，也就是說，《潘蜜拉第二部》仍偷渡了第一部裡頭的無法化約的主體性（134）。

一步探討啟蒙主體並非盲目服從自身理性，而是體認到自我主體性的並非至高、唯一的（“*privileged*”），並從一開始便帶著這般對於主體性「自反的認知」（“*a counterreckoning for subjectivity*”）（295-6）。於是，他所揭櫫這個由啟蒙以降的現代性主體，所倚靠的就是能在「言說者、聆聽者、與未參與的第三者」不同的觀點中自由進出人際關係（296）。更進一步的說，從語言的角度而言，這就類似於能隨時「採用並且轉換於第一、第二、第三人稱觀點之間」（297）。這也正是文初引言哈伯瑪斯特意在啟蒙文學中提及書信以及書信體小說的原因，因為一旦進入書信的世界裡頭，便是不斷的轉換主體的過程，因為書信不僅僅只是「你我」之間「寄送與存取」的對話，更需隨時抽離對話，從客觀他者的角度審視，並且預期對方的心理而來做出回應。哈伯瑪斯以書信的寄送與存取之間的動態過程，巧妙的比擬啟蒙主體的形成，也暗示著兩者之間緊密的關係。⁶

於是乎，給自己寫的日記便可視為一封寫給他人的信；而這點特性在許多書信體小說中也得到許多正反印證：比如說1740年的《潘密拉》（*Pamela*）後半部那些寫給她自己父母，卻因為被囚禁而無法投遞的信件，因她接連按日敘事，也混雜了日記體的形式，所以第二冊（Volume II）的開頭，連編者也將之稱為「日記」－“*The Journal continued*”（221）。而1774年的《少年維特的煩惱》（*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中維特的書信雖然名為寫給他的好友威漢，可是裡頭的信件既無稱謂、亦無署名，也鮮少提到威漢，通篇倒像是維特自己寫給自己的信，因此讀起來比較像是孤芳自賞的日記。更有甚者，寫於1778年的長篇書信體小說《艾芙萊娜》（*Evelina*），運用了數十位人物輪番上場，卻僅僅仰賴其中幾位主角作為書信的著述者，所造成的結果是，故事內容大部分都是透過艾芙萊娜的筆下一一帶出，敘述也串連在她連續幾封信之間，而非於書信往返中展開。正如同艾芙萊娜雖然寫的是信件，面對一連串接踵而來的事件，只得擲筆大嘆，「我的日記再也寫不下去了！」（“*I cannot journalize!*”），艾芙萊娜也以此暗示著，寫給自己的日記也隱含著寫給他人的信件（212）。艾芙萊娜在小說中所點出的，也正是哈伯瑪斯的

⁶本文所使用的「寄存之間」這個詞彙，是受到第三十五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的《寄/記存之間》的主題所啟發。正如徵文啟示所闡述，「寄存之間」強調的是記錄與記憶之間的動態過程，在本文中即是強調啟蒙主體透過書信的寄送與記錄所揭示的記憶。

觀察重點，西方個人主體性的衍生跟十七、十八世紀以來風行的書信寫作息息相關，而啟蒙主體透過十八世紀幾部重要的書信體小說的推波助瀾，找到了自己的語言與自由伸展的舞台，甚至於可以說啟蒙主體之所以啟蒙，正是因為認知到書信往來是如何與理性溝通、情感交流有著密切的關聯。

然而書信的寄存之間是否真能毫無阻礙的理性交流來達到哈伯瑪斯對於啟蒙主體的要求？本文以哈伯瑪斯所提出的書信與啟蒙主體性的連結作為出發點，再更進一步的去探討十八世紀書信體小說裡頭，如何透過書信寄存而不斷上演的錯置，並且討論這錯置又是如何對於啟蒙記憶的質疑與反思，進而影響我們對於啟蒙主體性的看法。的確，著名的十八世紀研究的批評家杜笛（Margaret Anne Doody）在討論十八世紀記憶時就曾強調啟蒙時期對於記憶的著迷，並且以之作為啟蒙「自我意識」（“consciousness”）的基礎，甚至於直言「啟蒙就是奠基在記憶之上」（67），意即指啟蒙主體就是透過記憶的過程成就其自我意識。同樣的，在《記憶文化》（*Memory Cultures*）一書中，也提及研究記憶就是研究我們是誰，而「記憶的歷史性研究更是與主體的歷史性緊密且無法分離的結合在一起」（Radstone and Hodgkin 2）。而在布雷（Joe Bray）以及哈伯瑪斯看來，還有什麼比書信文體小說這般更能展露自我主體性的文體呢？⁷這也正是論文從李察森（Samuel Richardson）1748年所著的《柯麗莎》（*Clarissa*）中所引用的標題「這份原稿太過真實」所嘗試指出的研究方向（889）：小說中，主人翁樂夫萊斯對於柯麗莎陷入瘋狂狀態下所寫的錯置信件，大嘆裡頭所呈載的書信記憶「太過真實」，以此觀之，研究書信體裡頭的記憶錯置正可以讓我們了解啟蒙的主體性又是如何的超越了理性的範疇。以下論文從兩點進行探討，一方面以啟蒙哲學為出發點，來探討啟蒙本身就已經隱含著自我遺忘的可能性，一方面以十八世紀書信體例作為基礎，來深究樂夫萊斯面對柯麗莎的信件而說出「這份原稿太過真實」的啟蒙意義。

⁷布雷的《書信體小說：意識的再現》（*The Epistolary Novel: Representations of Consciousness*）談的就是書信體小說對於自我意識的「益加複雜的呈現」（2）。

啟蒙的「踰越」與再省思

哈伯瑪斯對於書信的高度重視或許有待商榷，近來對於書信探討也並非全然繞著與啟蒙之間的關係打轉，但是他對於書信體例以及啟蒙主體之間的辯證關係，卻也提供了對於十八世紀寄存之間的另一個重要索引與反思。舉例而言，哈伯瑪斯或許只是想單純的表達在啟蒙理想之下，自我與他者隱含著毫無障礙的意見流通。事實上對於哈伯瑪斯而言，現代性是尚未完成的計畫，而他不斷的探討啟蒙理性的再進化，即是奠基在「溝通的理性」之上（communicative reason）（*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301），也因此書信的溝通往來便佔了重要地位。但即使如此，他卻也一再指涉書信交流中那個「寄」的動作 – 不管是寫給自己的日記或是第一人稱的敘述，都得要透過寄送的过程（「日記成為了一封寄給寄信人的信，而第一人稱敘述的文章成為寄給另外一個人的自我對話」），而非只是傳統所認定的書信是書寫者內心毫無障礙的真誠表達（*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49）。若是書寫者能夠真誠流露自我，根本也無須大費周章的還要去強調寄送的對象以及寄送的過程。換言之，哈伯瑪斯隱約也意識到文本絕非單一製作的存在，而是不斷將其內在性外在化的過渡，儼然成為一個寄存之間不斷變動的有機體，而這也暗示啟蒙主體非得要經歷過那寄出（寄送的對象）甚至於變動迷失（寄送的过程）的經歷。

誠如伊果頓（Terry Eagleton）所點出的，書信體小說就像是個可以不斷注入活水的「工具箱」一般，裡面藏著多餘的配件與空間，隨時可以重新改裝與配置（20）。所以在伊果頓看來，李察森的書寫小說的過程既有不斷反覆修改，又有因人設事來提供不同的情節與結局，就是活脫脫的例子（20-21）。從這點看來，李察森筆下的書信主體也有著同樣的書寫傾向：潘密拉極盡偏執地對於她的書信記憶不斷的重複記述，甚至於在知道了她的信件已經被Mr. B攔截之後，依舊願意繼續（重複）書寫，最後甚至於在求得Mr. B的同意之下，冒著再度被窺視的危險而寫信。而十八世紀書信體小說的世界裡有者更多諸如此類的寄存例子。費爾丁（Henry Fielding）為了諷刺《潘密拉》所寫於1741年的《癡密拉》（*Shamela*），裡頭就一再提及書信的真偽以

及其輾轉流傳的過程，甚至於連書信之外的奧利佛牧師自己也承認自己也經手插上一筆，暗示自己也可以是書信的收信人。所以當雪萊（Mary Shelley）在1818年出版《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之時，這樣的書信寄存更是益加複雜，不僅小說裡頭的三位主角（Captain Walton, Frankenstein, The Monster）不經意的互相成為對方故事的傳遞者，進而成為寄信或是收信的人，更可以從華頓船長的信中發現科學怪人的故事本身早就已經透過華頓船長的寄存而成為書信的一部分了。也就是這樣的重視書信寄存的氛圍之下，1748年克里蘭（John Cleland）筆下的凡妮（Fanny Hill）所寫的回憶錄，就這樣透過寄送的过程寫給一位不知名的女士，而奧絲丁（Jane Austen）於1790年所寫的年少之作《愛與友誼》（*Love and Friendship*）裡頭，明明伊莎貝爾自己就可以告知自己的女兒（瑪麗安）蘿拉年少時的荒誕間且荒唐的故事，可是卻又堅持一定要蘿拉透過書信的模式把她的回憶交代給瑪麗安。而這些書信體小說中都一再重複著書寫主體透過書信寄送的重要性，而非只是單純的自我述说的过程。

從另一方面而言，在哈伯瑪斯筆下所探討的書信，雖然提供了理性主體一個『愉悅』的發展空間，但這樣的『愉悅』毋寧說是『踰越』的、令人無所適從的，畢竟就像他所稱受到「情緒起伏」、林林總總的“我”也是複數的，我既是書寫主體，更有可能是受信人，這當中的複雜關係並不是哈伯瑪斯在字面上單純的鏡象關係就可以解釋：對於哈伯瑪斯而言，十八世紀的閱讀大眾將文學的「鏡子放在面前」，雖然還沒辦法透過「哲學或文學，科學或藝術」來達到「自我了解」，但是至少他們透過了書寫或成為書寫的對象，而有了觀察自身的機會（*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43）。但若考慮書信體的特殊性已經普及性，我們或許可以從哈伯瑪斯的認知中，在往前一步。塔克（Irene Tucker）在研究《艾芙萊娜》時提到，「如果說書寫主體、書信、跟收信人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那在主體與書信都是問題的書信體小說裡頭，所有的複雜關係將以乘方成長」（422）。簡言之，當書寫者寫信的當下，常常是因著寫信對象所可能有的反應而寫出書信內容，這點只需要看看1782年《危險關係》（*The Dangerous Liaisons*）這部集書信體小說複雜敘事技巧大全的法國小說，就可以發現裡頭不只是兩性之間的愛恨情仇，書信往來之間

的唇槍舌戰更是完全奠基在事先預測對方的反應之上。

再者，塔克更暗示著，閱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對於小說中「說話」的那個人，產生了認同的混亂。於是，對於閱讀者而言，在閱讀當下的那封信時，到底是要模擬臆測寫信那人的書寫狀態，抑或是假想小說中收到信的人的閱讀過程，還是作一個中立的第三者呢？更不用說小說中多的是那些空有提及，卻從未閱讀的那些信件。這些不同的狀態相互影響所產生的經驗匯聚，絕非一個單純的、自我形塑的啟蒙理性主體的概念所可以輕易囊括。

尤有甚者，哈伯瑪斯書中所舉的西方的十八世紀書信體小說，像是1761年的《茱麗，或新愛綠綺思》（*Julie, or the New Heloise*）、以及《少年維特的煩惱》都是屬於踰越的文本，前者開宗明義於前言即提到「這些書信都不是書信」— “these letters are no letters” —，小說表面上談論著的是充滿激情的愛情，書信往來間卻暗藏著一連串對於書信主體與記憶的質疑；而後者既是狂飆運動的代表作之一，更藉由文中所突兀插入的書信編者，來凸顯出書信往來的可能性，並非只是單純在小說文本上所見到的一來一往，而是受到許多書信以外因素的影響，比如說小說敘述者不斷地掛念於如何編纂、收集、排列、乃至於最後如何結束這些書信往來（7）。的確，從李察森開始，書信體小說中的編者便是書信體小說裡頭時常出現的「角色」之一。然而，他卻常常處於書信故事以外，也沒有明顯與書信作者之間的交集。而且，在這樣書信傳統裡頭，編者常自稱只是單純的經手書信，並強調書信的真實性，能像盧梭這般的自我質疑書信的可信度卻是少見。更不用說《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後段已經沒有維特的自我意識的存在，而幾乎是由半路介入的書信編者來繼續記述維特最後的下場。而這裡的編者敘述，已經無法單純的解釋為是為了簡單交代幾句書信終結後，所發生的事情而作的必要插入，因為後面編者的敘述不僅僅冗長，兼且充滿了壓迫感，彷彿就隨時隨地待在維特身邊，觀察了他死前的一舉一動，把編者的存在視為維特的分身（*doppelgänger*）也不為過。

從這裡看來，當然哈伯瑪斯藉由書信體小說的風行來驗證啟蒙對於理性交流與書信往來的重視，但是他筆下所呈現出來的啟蒙卻也同時具有自我質

疑與妄想的特性，兼且常常瞻前顧後，彷彿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明信片》（*The Post Card*）一書中所描述的書信體小說特性不謀而合：「當書信體小說層出不窮之際，正是歷史出現嶄新的寄存危機」（232）。換言之，十八世紀書信體小說的風行與啟蒙主體如何記憶來面對這新的歷史轉折有著密切的關係。⁸哈伯瑪斯似乎在說（抑或是沒有全然說出），書信之所以啟蒙，絕不是只是單純的提供了書寫者一個自我記述、觀察、與反省的出口，反而是因為十八世紀的書信寄存之間，某種程度上必須經歷了失根般自我否決，乃至於遺忘，才能算得上是啟蒙的體現。

這樣的啟蒙並不是無的放矢的。在康德的〈何謂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中，他提到了人人皆有理性之能，所以啟蒙的問題並不在於能不能，而是要不要的問題：「自我枷鎖的蒙昧並非因為缺乏理性，而是缺乏不靠他人指引的決心」（58）。他又繼續解釋到，啟蒙時代之開展，「唯有[倚靠]自由…也就是能夠對任何事務使用公眾理性的自由」（59）。也就是說，唯有個人倚靠著公眾理性的自由（free use of public reason），唯有在主體能以公眾自居之時，「啟蒙」，這般帶著倫理急迫性的個人天職才能開展；而倘若個人沒有勇氣掙脫枷鎖，則意味著集體意志的沈淪，啟蒙就無法達成。在康德的筆下，啟蒙不再只是理性算計下的結果，而是主體忘卻自身而去融入社群的情感表徵；於是啟蒙主體不再是單純的自我意志的展現，反而暗喻著某種程度的去主體性。⁹

如果再更進一步的去查看康德其他的哲學思辨，就會發現其實康德對於理性啟蒙的看法一直是帶有某種程度的反理性的、自反的特性。在康德的《判斷力的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一書中，他提及我們對於美或是崇高的感知能力，並不是從任何的概念中所衍生出來，而是在於他所謂的「無目的的目的性」（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對他而言，任何對美或崇

⁸奧圖曼也提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德希達的〕假設值得進一步從歷史的角度去探討」（215）。

⁹就這點而言，巴特勒（Judith Butler）針對女性啟蒙以及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也有很類似的看法。對於巴特勒而言，「女性主義的理論試圖了解系統性的或是滲透式的政治與文化結構是如何透過個人行為與實踐來執行和複製，以及藉由把問題放在更廣的、共享的文化脈絡中來讓個人情境的研究可以清晰化。的確，女性主義的渴望…通常是源自於理解到我的痛苦或沈默或憤怒或感知最終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903）。於是，性別的啟蒙不再只是自我的啟蒙，而是某種「自我意志以及性別操演」撮合下的「肉身風格」（902）。

高的感知若是有了先驗的基礎，那就是帶有目的性的了，那便無法體現其普遍性。唯有主體的「普遍性的聲音」（“a universal voice”或是“subjective universality”）才可以體現美與崇高。這裡康德留下了值得玩味的例子，「於是他說，『這是美的』；而且他並不因為已經聽過別人之前無數次的認可而指望別人會同意他這意見，而是他強加在他人身上的。若是他人不同意的話，他會否絕他人的品味，雖然這品味亦是從他人身上需求而來的」（378）。這裡康德想要說明的是，人作為感知的主體，唯有時時刻刻乘載著林林總總「需求而來」卻又被我們否決的他者，才有窺探未知的美與崇高的可能。這點巧合地與史碧瓦克有所相同之處。她引用佛洛伊德與拉岡，來討論啟蒙理性對於「在地線民」（native informant）的「據斥」（foreclosure）：

拉岡如此界定據斥…透過翻譯佛洛伊德而成為自己的語言，來說那「從象徵界（the Symbolic）被排斥而重新出現於實存（the Real）」。
因此，據斥是跟佛洛伊德所說的「原初歷程」有關，表徵了兩個互為表裡的過程：「…引介入主體…趕出主體。」（5）

從後殖民的角度，史碧瓦克認為，啟蒙主體形成過程中也是透過了「他者」的引介以及其逐斥。¹⁰更重要的是，康德所援引的例子中，主體也適時的遺忘了他所「需求而來」的。在康德的啟蒙倫理計畫中，主體不再全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亦非洛克筆下等待填寫的空白，而是一次次自身與他者、私人與公眾、失憶與記憶的反覆集合。這樣的無所適從更近於卡索（Terry Castle）在《女性溫度計：十八世紀文化與詭異感的問世》（*The Female Thermometer: Eighteenth Century Culture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Uncanny*）中所闡述之啟蒙的目眩神迷、顛三倒四：「那些帶來令人讚頌的理性年代或啟蒙的心理與文化上的轉變…就像某種有毒的副作用，卻也給人新的怪誕、焦慮、徬徨還有智性僵局的體驗」（8-9）。

¹⁰請參閱史碧瓦克的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裡的第一章「哲學」，其中四到六頁對於據斥的過程有詳細的解說。

啟蒙的記憶焦慮

以此觀之，如同文初哈伯瑪斯所暗示的，正因為是帶著失根、體驗意會到某種程度的無所適從，所謂的啟蒙才具有「啟蒙」的完整意義，那麼與之息息相關的書信記憶也無疑地將伴隨著這般的左支右絀，對於寄存之間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必將有所衝擊性的認知。根據布蘭特（Clare Brant）所研究的十八世紀大眾書信文化，十八世紀的書信作家不僅僅把私人書信往來視為可能付梓的公共文件（6-9），更有甚者，這些書信早已經不全然是個人情懷的抒發管道而已，反而比較像是充斥著各式角色競演的場所。如她所說，「十八世紀書信體例之所以迷人的原因之一，在於它提供了作者進入不同角色的扮演以及不同的角色扮演之機會…書信也與演戲、爭執、幻想與奇幻息息相關」（26）。於是乎，書信中既是各種身分的集合，更有可能是複雜內心的怪誕與想像的開端。凡此種種點出了寄存之間種種可能產生的認同問題，也正符合傅柯帶著諷刺意味所談到的，「何不將書信歸為署名者所有－它並沒有作者」（1481）。

由此，我們亦可以再來對照啟蒙哲學家們對於記憶與書寫的「焦慮、徬徨」。比如說，杜笛就對洛克有著精闢的描述：「下筆總是帶著對於消逝記憶以及伴隨而來的智能喪失充滿警覺性、詩意般的恐懼」（68）。洛克在其著名的《人性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提到，「我們的年輕時的思想，就像孩童，總是先於我們而逝去；而我們的記憶描繪出這些我們即將步入的墳墓；那裡雖然銅器與大理石依舊，上頭的刻印隨著時間模糊，而圖案日漸腐朽…若沒有偶而擦拭，則會消失殆盡」（2.10.5）。洛克在這裡所面臨到的是一連串啟蒙理性思維的邊際：一方面，對於洛克而言，正常記憶是不斷累積外在感官印象的過程，是一張等待「感知與反省」來填補的「白紙」；但是另一方面，如上述所言，記憶也可以視為是某種自我遺棄的過程（2.1.2）。記憶既是一種累積，又同時是一種消逝，而從這裡所呈現出來的理性主體，不斷的往前累積新的經驗，也不斷的往後追朔那些「我們即將步入的墳墓」。也因此，不僅僅只是「先於我們而逝去」的童年反轉、拋棄了那不斷累積的過程，更有「這些我們即將步入的墳墓」，來暗示著最終的空無一物以及全然的遺忘。

洛克又更進一步的提及記憶「快速的消逝，而且常常不及駐足，留下的不過是片段足印或是殘留的型態，好比越過田野的陰影一般」（2.10.4）。在這裡可以更深刻的看到洛克對於記憶的描述夾帶著一絲詭異的意涵在內，若不是陰影，就是成了作為埋藏或丟棄的墳墓；在此，記憶既是需要「能夠復甦那些經過銘刻後消失了或是不見蹤影的想法」，然而這些「想法既是存在又不存在於記憶裡頭」，著實令人無法捉摸（2.10.2）。

如此一來，洛克的記憶披覆著杜迪所描繪的「哥德式」（Gothic）的意象，呈現了如同佛洛伊德所說的詭異感（the uncanny）—對於佛洛伊德而言，詭異感源自於原本應該要掩蓋的，卻不經意的被揭開了心理過程（70）。也就是說，在啟蒙記憶的理性外衣包覆之下，卻是「陰影」甚或「墳墓」般的不確定性，而卡索也在討論啟蒙思潮的《女性溫度計》中提到：「佛洛伊德所謂的詭異感本身就是種魅影一般，從黑暗中浮現」（7）。如同佛洛伊德在〈詭異感〉（“The Uncanny”）一文中所開宗明義說的，詭異感的探討是源自於「美學」的，更進一步的說，詭異感「不限於美學之中」，而是更與我們的「美感經驗」有關（123）。這點更可以從佛洛伊德的文章中，並不直接討論精神分析，反而是從字典以及字源學角度去看詭異感的轉喻（metonymy）過程，而文章大部分也著重在分析閱讀赫夫曼（E.T.A. Hoffman）1816年所著的志怪短篇〈沙人〉（“The Sandman”）的美感經驗，而窺得一二。¹¹

在這裡，我們找到了洛克與康德之間隱約的關聯：如果洛克的記憶呈現出哥德式意象的詭異感，那也正是因為洛克的記憶也是一種美感經驗，就如同他所自述的「那些能夠停留最深最久的印象，是那些伴隨喜悅與痛苦的」（2.10.3）。對於洛克而言，記憶既是自我認同的根源，卻也換得了那些揮之不去的焦慮與徬徨。而反過來說，既然記憶類比於美感經驗，也就失了根

¹¹換言之，整篇〈沙人〉可以說是佛洛伊德所謂具有美感經驗的詭異感的具體表徵。有趣的是，如果說啟蒙主體倚靠的是書信交流，而卡索在《女性溫度計》中主張，啟蒙所帶來的某種智性的壓迫，造成了詭異感的問世（8），那麼〈沙人〉一開頭的主人翁之間以書信回顧兒時回憶更是間接暗示了書信記憶與詭異感的連動：小說裡頭的角色互換，不管是敘述者跟主人翁南山尼爾、克拉拉與女偶奧寧帕、甚或是沙人與柯波拉以及柯波里爾思之間，都有著詭異的相似之處。另外，小說開頭南山尼爾的書信記憶也原本會被掩蓋的，卻不經意的在第二封信中被克拉拉錯誤的揭開了，也才導致了後面詭異的發展。

（「無目的的目的性」）。透過洛克對於記憶的觀察，我們要問的是，這樣子失了根的、詭異感的、自我遺棄的記憶，到底如何的在書信體小說上找到著力點呢？

從盧梭的身上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看到啟蒙記憶與書信體之間的糾葛。既是啟蒙思辨的大師，本身又寫過掀起風潮的書信體小說，盧梭穿梭在理性與熱情的矛盾之間，對於啟蒙的寄存有著獨特的見解。首先，在《懺悔錄》（*Confessions*）裡頭，盧梭所念茲在茲的重點之一，就是不斷透過對於何謂真實呈現來闡述它對於書寫記憶的看法。舉例來說，他提到自己記敘時因為太過「熱情急躁」了而無法立刻下筆，導致最後總是草草的以「雜亂的、皺巴巴、混淆、無法辨識的手稿」來收場（113）。反而是唯有慢慢沈澱，「熬過」所有換場景時的「騷動」，全部的記憶才會「無所遺漏」，成就了像是義大利歌劇般令人賞心悅目的場景（113）。對於盧梭而言，真實的記憶與書寫，就是要靠「熬過」那些林林總總「雜亂的、皺巴巴、混淆、無法辨識的手稿」，才能終至臻境。如他所說，

唯有在林木之間的步行，或在睡不著的夜晚，我在腦子裡書寫；你可以想像我寫的多麼的緩慢，因為我完全沒有語言記憶而且一生能夠背誦的詩句寥寥無幾。有一些段落我心裡頭寫了又修、修了又寫五、六個夜晚才能寫在紙上。（114）

這裡盧梭不再靠語言記憶來書寫，因為能蒐集到的不過「寥寥無幾」，最終取得的只不過是另一種無法辨識的手稿。然而他所提出的替代記憶 – 那近似於圖像式的、在腦子裡頭反反覆覆斟酌的書寫記憶 – 不也是一種等待翻譯的「雜亂的、皺巴巴、混淆、無法辨識的手稿」？記憶對盧梭而言，是不斷地書寫，不斷地重複錯誤的過程，就好比佛洛依德筆下的神奇複寫板一樣，暗喻著透過不斷地忘記了而得到某種形式的記憶。¹²於是盧梭需要另一本《漫步遐想錄》（*Reveries of a Solitary Walker*）來重複他的《懺悔錄》，而非只

¹²佛洛依德在〈神奇複寫板〉一文中提到，如果把記憶比擬為神奇複寫板的作用的話，那人類記憶的過程就取決於複寫板上那層複寫層揭開後所遺忘的。另外，尼采在〈論歷史的使用與誤用〉一文中，也提到了生命不能沒有遺忘的概念。

是單純接續之前的故事記敘。而在他的《懺悔錄》最後一頁也留下了相似且值得斟酌的字句。用了近乎自我指涉性的手法，他在《懺悔錄》文章之後再加上一段，提醒讀者《懺悔錄》是唸給一群貴族聽的，所以他所懺悔的內容不僅僅是記載於文本之內的，亦是口說的，如果再加上他刻意在文本之外所加的這段記述，這樣的多重書寫更是活脫脫地呈現出啟蒙寄存之間的動態關連。

這樣的經由自我丟棄、遺忘而達到某種真實，透過盧梭所寫的書信體小說《茱麗，或新愛綠綺思》，更是展現了益加複雜的辯證關係。畢竟，書信體小說裡頭，每一封書信都隱含著寄、閱者；尤其在書信的寄存之間，又隱含著各式移動的路線，一會兒書信被攔截、一會兒又是投遞錯誤，更不用說被拿來轉寄甚至於謄寫。每一種牽絆都隱含著無數種的可能性，不管是進行中的，還是尚未到來的，也相對印證了在書信的寄存之間也是一種失根游移的過程。¹³

也因此，盧梭對於書信體如何記述記憶也是鑿斧很深。小說一開始在第二篇前言中，就由“R”（雷同於“R”-ousseau 的編者）提到說，因為《茱麗》缺乏可分類的型態，而且又背離了書信的典雅，反而才能夠讓使人著迷：

去讀試圖展露機鋒的作者在書房寫的情書。如果他腦袋裡頭還有一絲火花，至少他的信還可以燒掉信紙一角；不過熱力就無法再傳送了。你會覺得欣喜，甚至於心頭還有點顫動。相反地，真的充滿了愛意的信；由真正熱情的愛人所寄的信，會是斷斷續續、鬆散、充滿累贅、不連貫、重複的篇章。他的內心情感澎湃，一直重複說著同樣的事情，也不會停歇，就像湧泉般永不止息。既不清晰，也不獨特；不管是字、轉折、還是句子都無法令人難忘；沒有一項是令人讚嘆的或是印象深刻的。但是我們就是會感覺到心靈化掉了；我們不知為何而感動。

(10)

¹³這裡的書信往返近似於德勒茲與瓜達西（Deleuze and Guattari）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一書中，所探討人類主體的「脫逸路線」（*Lines of Flight*）。

對於盧梭而言，倘若斤斤計較，只想要以理智地算計、塑造出書信的情感效果，結果通常是枉然的；而這點在當他在對十七世紀後期所出版的《葡萄牙修女手札》（*Letters of a Portuguese Nun*）的書信作者性別做出臆測時，也有類似的論點：

那些燃燒心靈、閃耀光芒的聖潔之火，那揮霍並需索無度的才華，那熱情的雄辯，那些令人打從心底狂喜的渾然忘我，是絕不會出現在女性的書寫裡頭：她們的寫作就像她們一樣既冷冽又漂亮；即使有再多的機巧，卻沒有任何的靈魂；而感傷百倍於熱情。女人既不知如何描述或感知愛情…我敢打賭這些書信是男性作家所寫的。¹⁴

在盧梭的眼中，《葡萄牙修女手札》之所以在十八世紀掀起風潮，正是因為書信裡頭放蕩不羈的熱情，而不是「機巧」的計算。在理性思維下，傳統屬於女性場域的熱情，在盧梭的眼中，並非真實的熱情，真正的熱情是超越的，也只有在男性的理性之下才能展現。對於盧梭而言，唯有暫時丟棄、忘記了理性 – 超越了理性 – 才有真實的理性。¹⁵因此，書信體作為承載情感的文類，往往是在最不經意、最紊亂、最捉摸不定時，換句話說，丟棄了、遺忘了、失去了寄存目的地之際，才能發揮最大的能量。¹⁶對照他的文字與圖像記憶，不也是在一次次斷簡殘篇中，試圖去呈現那令人心曠神怡的場景？再看看R在前言中所說的，「這些書信並非書信」，不是再次驗證了，對於盧梭而言，書信體之所以適合茱麗與聖普魯之間的纏綿悱惻，倚靠的不就是書信體所展現出的非理性的理性，某種錯置了的、自反的特質？

於是乎，整本《茱麗》就像是一個不斷重複這樣特質的架構。不管是前言也好、第二前言也好、裡頭的書信往來也好，「就像湧泉般永不止息」，

¹⁴筆者所述盧梭的這個段落是擷取自簡森（Katharine Ann Jensen）的《書寫愛情：信件、女性、以及法國小說，1605-1776》（*Writing love: letters, women, and the novel in France, 1605-1776*）（xiv）。

¹⁵布蘭特提到，十八世紀對於女性書信書寫呈現出矛盾的態度，一方面讚揚女性是天生的寫信者，一方面又批評女性的書信自然地會毫無章法（18）。

¹⁶而在同時期由柏妮所創作的《艾弗琳娜》也有同樣的論證。當主人翁歐韋爾提到艾弗琳娜的臉紅是否是真是假的時候，他說，「自然與真實的臉色，對我而言是很容易看出來的；自然之色是斑駁、多變的；而屬於人為的，單調兼且太過於平順；它缺乏了某種生氣，那份光芒，那無法描述的某種特質；那種特質是即使我現在看到，會完全超越了我的表達能力」（67）。

互相諧擬。裡頭的不同角色所寫的書信，「既不清晰，也不獨特」，於是茱麗與聖普魯的書信常常互換角色，以至於到最後兩人的信件越來越像對方的鏡像一般，甚至於連此時誰在寫信或是讀信也都被刻意模糊掉了。¹⁷這類的遺忘與錯置一再成為小說探討的焦點。舉例來說，當聖普魯詢問沃瑪（茱麗的先生）如何使他的花園整理的如此劃一，沃瑪反而回答道：「這裡無一物對齊，沒有任何層次；沒有任何的線條闖入此地；自然在她的畫作之中從不運用任何線條」（393）。一如前述，這裡的劃分無需線條，就猶如美無需任何雕琢、任何人工的定義。越是失序、越是一反常態、越是失去了所依歸的線條與方向，某種美感經驗才會油然而生。在盧梭的哲學、美學思辨之下，書信記憶的錯置獲得了啟蒙論證的基礎，彷彿對盧梭而言，即使書信曖昧不明、內容毫無章法、又失去了自我風格，卻反而才能真正的觸及記憶的核心。就這點來說，我們將回到掀起十八世紀書信風潮的李察森，來看看他如何透過對於書信體例擬真的要求，同樣的也對於啟蒙記憶的呈現有了相類似的結論。

柯麗莎的書信錯置以及書信倫理

作為伊果頓口中的「有機的知識份子」，李察森試圖透過書信體小說來替十八世紀剛萌芽的中產階級發聲，並藉此闡揚某種可依循的道德觀（2）。他所寫的書信小說中的女主角，不管是潘密拉或是柯麗莎都藉由書寫記憶來作為成就己身的載具，並且能夠以此對抗書信中的父權以及貴族階級對於女性性別的壓抑。可以看到的是，李察森的念茲在茲的是如何替啟蒙主體尋找一個可以倚靠的書信呈現。於是，一方面，就像畢比所言，「每一封信都代表著一個階段的心智成長」（3），意味著書信內容將內心化約為表象的透明語言，而另外一方面，一封信也可以如同伊果頓所言，文本的物質性受到注視，被「企求、保護、親吻、埋藏、淚滴、攻擊」，不僅像極了小說主人翁所親身遭遇的事件一樣，更可以讓讀者貼近敘事而且也能感同身受（59）。

¹⁷胡錦媛在〈捕蝶人〉一文中亦提及書信的互相反映的摺疊作用（423-4）。

但李察森的難題就在於，這樣擬真的語言，卻常常溢於言表。¹⁸於是弔詭的是，柯麗莎的書信記憶往往不是她自己的，好比她在小說末了所交代的書信遺言，就是透過貝爾佛的傳遞給她的哥哥詹姆斯。更因為柯麗莎並沒有時間描述她「悲傷故事裡頭的細節」，所以她還央求貝爾佛抄寫他手中兩封樂夫萊斯的手札，方能「將所有相關故事細節補齊」（1418）。另外，當柯麗莎寫出一連串無法辨識的書信時，扮演樂夫萊斯爪牙的多卡絲（Dorcas）似乎也意識到這些斷簡殘篇的某種意義，於是她要求樂夫萊斯把殘破的信件放回桌子下，進而成就了柯麗莎的控訴（894）。這樣一來，柯麗莎的書信記憶不僅僅「詭異」地透過她的迫害者而送出，更得要倚靠貝爾佛的書信，以及透過像是多卡絲的角色的存在才有目的地。

而這樣的詭異感在《柯麗莎》一書中隨處可見。一方面，書信既是交流，原本就是相互對於相同事件的回應，於是在許多的情形下，書信小說中的寫信人總是得要寫下自己的想法，心裡頭也暗暗忖度他者的想法，進而行諸於字裡行間。另一方面，書信的開展也意味著他者的必然存在，從而暗示了意義溢於言表的可能性。的確，小說中，柯麗莎與樂夫萊斯既是互相對抗著，卻又在書信中交疊延伸著，於是，才有伊果頓所提到的，樂夫萊斯嘆息有柯麗莎這個比他（樂夫萊斯）還要「高明的分身」（59）。於是在平行的書信結構下（柯麗莎與樂夫萊斯的書信在小說後期並沒有太大的交集），我們看到了在接續的書信中，他們兩人延續著相同的主題：樂夫萊斯可以批評柯麗莎「自己跳出馬車」因而喪命（971），但在柯麗莎的認知裡頭，她不過是「費心解救一位溺水的可憐人」，而因此「溺水」（這點在李察森的《潘蜜拉》裡頭所描述的潘蜜拉以及 Mr. B 之間的關係時，也隨處可見他們的書信互相洩底，只不過差異在於我們大部分都是從潘蜜拉的筆下得知 Mr. B 的一舉一動）（985）。

李察森對於記憶錯置的問題，進一步可以從柯麗莎被迫害的身體，觀察到複雜的處理手法。就在柯麗莎遭到玷污之後，她寫了一連串書信，而讓看過信件的樂夫萊斯大嘆，「我無法放手；這份原稿太過真實」（889）。這些信看似信件，卻被李察森以迥異於其他信件去編號而稱之為「紙張」

¹⁸關於李察森試圖透過各種手段控制他筆下著作的意義呈現，可參考伊果頓的《柯麗莎之劫》，頁 20 至 29。

(papers)；然而李察森的讀者很快就會發現，作者對於書信的各種印製的體裁有著敏銳的觀察與使用方式，對於它所呈現出的效果也都是極盡算計之能事，包括每一種轉印總是隱含著非常細膩的意涵在內。比如說眼尖的讀者便會發現，潘蜜拉的書信後所附的「便箋」(notes)，便常常成為潘蜜拉偷渡她的僭越思維之處。¹⁹實際上，這些所謂的紙張在柯麗莎寫完之後，不是被揉掉、不然就是被撕毀丟棄於桌子底下，更有些是被抄寫後傳遞，而他們在印刷上的呈現，也就如同柯麗莎被侵犯了的身體一樣，打破了傳統框架的章法與型態，意圖展現出柯麗莎受創傷後所呈現出的瘋狂症狀。比如說，這些「紙張」裡頭，句子一反印刷的常態任意穿插，彷彿柯麗莎在自己的書信上頭再寫上自己的旁注(marginalia)，除了以手寫來增加信件的可信度之外，並暗示柯麗莎自己的精神呈現不穩分裂的狀態。除此之外，柯麗莎大量使用破折號，也連帶的使著讀者產生閱讀障礙，比如說編號Paper I的紙張的文末就是一例。另一個特點是，這些姑且稱之為信件的紙張，不但缺乏收信人的稱謂(除了十張紙張中的Paper I、II、IV、以及V之外)，就連柯麗莎自己也沒有簽上姓名，等同拒絕承認這些紙張所代表的意義與責任。如果再細看這些短簡殘篇的內容，似乎也在暗示主人翁所呈現的發瘋狀態已經無法完整敘述她自己的經歷，好比說，每當柯麗莎提及「恐怖的遭遇」時，她便無法繼續她的敘述(890)。就像Paper X中所敘述的，她的思緒已經離她遠去，讓她「忘了她自己」還有「那天的罪惡」(893)。這些透過書寫所呈現的一舉一動，便讓樂夫萊斯懷疑柯麗莎的「智識是否就此損壞」(888)。

然而雖然前前後後樂夫萊斯一直在替自己找理由，可是這些書信還是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一方面，樂夫萊斯認為這些紙張不過是短簡殘篇，不具有任何實際的控訴功效。於是他在包含這些紙張的信件中告訴貝爾佛，這些紙張或許會「給予」貝爾佛一些批評他的「新武器」，不過他也勸貝爾佛省點力氣，無需多費唇舌(889)。但另一方面，就在他自己信件的末尾，他自己也說，「她的記憶，在她的自在翱翔的詩意中，展現了驚人的作用，一點兒也沒有損傷的跡象」(894)。就在讀者閱文至此，樂夫萊斯也同樣地把信中

¹⁹請參閱《潘蜜拉》第一封信裡頭所夾藏的便箋。這裡頭，潘蜜拉輕描淡寫的提及她使用以過世的女主人的換衣間作為她自己的書寫信件之處。她也在此處暗示，Mr. B 已經開始對他有意思了，可是她又故作鎮靜。

所附上的紙張「看過了一遍」，開始察覺到這些書信片段的意義（894），並且拒絕幫貝爾佛抄寫一份副本。李察森彷彿在暗示，柯麗莎的書信之所以能夠完整傳遞她的記憶與控訴，反而是當書信不再是書信，而是隨意丟棄的紙張之時，或是當書信內容無法辨識的時候。更重要的是，如果說樂夫萊斯代表了李察森所亟欲反對的貴族階級，又為何要大費周章的讓柯麗莎的記憶與自我意識與樂夫萊斯沾染、糾結在一起呢？這裡面除了書信體小說必要的技巧之外，李察森對於書信寄存的錯置運用，也顯示了十八世紀透過記憶片段之延異與演繹，來探討記憶是如何在書信往來中分散、擬真、甚而不復得。畢竟，這些信件是透過樂夫萊斯之手才得以重見天日，這也就是意味著，這些書信記憶將與樂夫萊斯詭異的連結在一起，而非只是存於紙上、那可供自由存取的文字而已。

李察森對於這樣的書信錯置顯然不是一時興起的。對於他而言，進入書信的世界裡頭，某種程度就像是進入卡索先前所說的，某個令人目眩神迷的境地，一如他在《潘密拉》中所呈現出來的一般。這本小說中也有一封可援引為證的錯置書簡。當潘密拉接到Mr. B所寄給他的逼婚通知信，她也進行了一連串的錯置與改寫；李察森似乎在向我們暗示，一旦進入書信的世界，書信反而失去原先作為書信本身的功能，就連承載的意義也可能產生質變。首先，潘密拉將Mr. B寫的最後通牒和她自己的答案並呈，除了方便閱讀書信的人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雙方的問題與回覆，更暗示雙方平起平坐。而潘密拉這樣的回信也可視為是整體書信往來的縮影，畢竟Mr. B每提一個問題，潘密拉就會也針對問題寫下她的回覆。²⁰然而在自然的對答中，讀者卻也發現一絲不對勁：眼下的這封信到底要視為潘密拉實際寄出的信件？抑或是潘密拉所想像出來的實際對話方式？

如果我們想像答案是前者，實際上是把整個書信文類所承載意義的能力畫上一個很大的問號。雖然讀者知道我們正在窺探的是潘密拉的日記，但不用什麼特別的稱謂與劃分，我們也可以猜測的到目下的文字是潘密拉所寫給父母親的信件，而這段對話也可以視為潘密拉所附的附件，一如她在信中所

²⁰若要進一步對潘密拉對於書信真實與虛構之間關係作討論，可以參閱拙作 *The Other Enlightenment: Excess and the Epistolary Novel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中的第一章。

述：「我在信中附上一份謄稿供你們參閱」（193）。問題是，單純的信件往返怎麼會變成左右兩欄，而且是方格化的編排方式？很顯然的，這封所謂的信件是無中生有的。若是潘密拉真的以兩者並呈的方式謄寫了一份給她的父母親，那在這裡頭，我們也看不到Mr. B自己的信件，彷彿對於李察森而言，已經無所謂信件真實與否的問題。²¹

如果答案是後者，這些信件是李察森藉著想像潘密拉的心理狀態或是回應方式所推敲出的印刷策略，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怎麼樣的對於書信真實的要求，使得李察森寧可放棄了書信中所沿用的書信體例，轉而在關鍵的時刻擁抱了無中生有的書信往返？這難道不是預示了李察森在《柯麗莎》中同樣對於女主角的內心狀態的書信想像？這不就意味著，在李察森的書信世界中，書信不僅僅只是虛構的，而是更強調在這關鍵的時刻，唯有書信錯置了、不再只是單純的書信而已時所具備的感染力更大？而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封信，就會發現這封錯置的書信所引起的困惑，並不會少於樂夫萊斯的嘆息。首先，讀者到底是要先讀完Mr. B的書信在去讀潘密拉的回覆，還是要照著李察森的想像一一瀏覽兩人的唇槍舌戰呢？如果先看Mr. B的信，每讀一段，就會有一片空白（因為潘密拉在右欄的回覆總是比較多），所以他的信就像是一封被潘密拉撕毀的信件一樣而片段化了。如果我們跟著潘密拉的書寫方法去閱讀，那我們更是陷入困惑，到底我們讀的是一封附件？還是兩封信並呈？是謄寫的，還是說從頭到尾根本沒有這封信，只是方便小說的衝突所作的印刷安排？更令人費解的是，當讀者讀完Mr. B與潘密拉之間對答之後，信件並沒有就此結束，而是我們繼續讀著潘密拉右欄的回覆一段之後，才赫然發現潘密拉的回覆已經悄悄的回覆成為信件的正常欄位，而非左右格式化的對分。²²在這裡，書信的界線被打破了，我們不知道我們讀的到底是誰的

²¹有關這封兩人之間回覆的附件版本就已經足以用論文的形式作研究。如同先前所述，《潘密拉》在李察森的手中就已經經歷過無數修改，更不用說，十八世紀的盜版暢行，所以有關這封信件的印刷呈現就已經可能族繁不及備載。筆者除了十八世紀資料庫中的版本以外，手上當代的Oxford版本、Penguin版本、以及網路的版本，就有三種不同的列印方式。Oxford的版本如同前述，而Penguin的版本，則是暗示這封信完全是潘密拉所篇纂的，因為在Mr. B的欄位，潘密拉已經直接省略掉稱呼（“To Mrs. Pamela Andrews”），以“HIS PROPOSALS”取代。網路的版本則是完全省略刻意的排版，讀者看到的只是上下兩封接續的書信。其他還有很多的差異，這裡只取最明顯的差別，以供參考。

²²如同附註二十，光是這裡的結尾就有好幾種版本。

信，是附在哪裡的信，對於寫信的人何時停筆也無從得知。甚至於連Mr. B的「哀的美敦書」都成了完完全全的附件（不管是概念上或是形式上），而且還是降了級的附件，因為這封原本應該被放在潘密拉寫給父母親書信中的附件，已經被完整的包覆在潘密拉的回信之中，彷彿一座李察森的書信迷宮。而如果從小說之後的發展而言，Mr. B的困惑並不會因為他們的和解而有所改變，因為他還是著迷於這個介於「虛構與真實」的世界裡，（或許比真實還要真實的世界）繼續要求潘密拉寫信供他閱讀，彷彿他就像是故事外的讀者一般。

從這裡再回去仔細推敲文章標題所引述、樂夫萊斯說的「這份原稿太過真實」（“The original is too much an original”），就可以發現另一層意義。我們當然可以相信樂夫萊斯在看到柯麗莎心智受創後所寫的斷簡殘篇，突然意會到自己的放蕩行為並不足以給他帶來任何的喜悅，更不用說愛情。於是乎，如同不少書信體小說所一再上演的「見信如見人」的劇碼，他眼下所閱讀的紙張就好比柯麗莎在他面前所展露的殘破不堪，做了嚴重的控訴，因而導致了他的嘆息。可是，透過本文所闡述的脈絡，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另外一種屬於十八世紀寄存之間的讀法。也就是說，當那失了根、無處遞送的紙張突然有了出人意料之外的出口與目的地之時，當這些紙張「逾越」了信件該有的合典入律，以及理性主體的範疇時，它們反而讓樂夫萊斯驚覺到這些書信錯置所帶來的詭異感。也是在這樣的寄存之間，「原稿」才不再與單純的真實畫上等號，而是隨時可以自我僭越，比真實還要真實（“too much an original”）。在這裡，我們更可以發掘樂夫萊斯的嘆息的另一層意義。如果我們把“original”重新放在十八世紀的歷史框架之下，就會發現original作為一個文化上的概念，正處於劇烈轉變的階段。新古典主義風潮下所帶來的今古之爭，正代表著那個崇尚西方文明起源（origin）的original（起源的、本體的）的概念，正慢慢為另一個original（創新的、前所未有的）的概念所取代。德萊頓（John Dryden）1700年在他的“Preface to Fables, Ancient and Modern”就已經揭櫫了original的新的意涵，乃為自創的、新穎的。如果參照*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更可以發現 original 作為一個嶄新的意義，乃是在十八世紀開始有了大量的使用。對於樂夫萊斯而言，或許他所看到的書信錯置不僅

僅是帶給他比真實還真的震撼，而也可能是因為意會到那個不為人知的柯麗莎，那個嶄新的柯麗莎。

而類似於前者的看法在當代閱讀上依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在1985年Penguin所出版的《柯麗莎》版本中，所有的這十張紙張都與前後的書信，透過換頁的方式巧妙的隔開了，適當的創造了一個屬於柯麗莎自己的獨立創作空間；然而在1748年的版本中，樂夫萊斯的書信與柯麗莎的Paper I、X之間並沒有適當的界線，尤其是後者原本可以獨立成頁，卻是在同頁裡頭硬是塞進了樂夫萊斯的兩行話。²³在這裡李察森又使用了印刷排版的手法，讓讀者進一步意識到柯麗莎的書信記憶是如何的與樂夫萊斯互相纏繞。於是乎，藉由樂夫萊斯的介入，這些紙張找到了新的出口與聲音。這些紙張不再只是一張張的紙而已，而是新的信件，一如它們強迫樂夫萊斯接受「十倍於正常心智的批判」，也強迫我們去發掘柯麗莎的書信與紙張、記憶與遺忘的嶄新局面（894）。

最後，我也希望透過這篇研究，可以將書信體例帶進書信倫理的討論中。近來批評界所熱衷的記憶轉向也足以提供了另一個佐證的方向。王德威於《張愛玲給我的信件》（2012）一書的跋，提到了「信的倫理學」，也就是「互信的可能性」，以及通信中所衍生出的「意外的出口」（400）。從張愛玲寫給夏志清的書信，乃至於夏志清為了這次書信集所寫下的回復「按語」，在在的顯示出書信往來所隱涵的潛在可能性。而施恩惠透過研究德勒茲與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也提出了「記憶即他者」的想法。根據他的研究，「主體無法透過主觀意識掌控、描繪記憶的內容」，「唯有將自我分離於主觀主體之外」，「才能一窺記憶的奧秘」，正好與啟蒙有關記憶的潛文本有著相同的關懷（91）。而這也是德希達文初所提及寄存危機的最佳註腳：只有當書信記憶錯置了，只有當主體能夠暫時地遺忘了，才有不斷啟蒙的可能性。而透過這樣的書信記憶的錯置，我們不僅可以繼續去探討十八世紀書信

²³巴克斯（Janine Barchas）在她的《圖案編排、印刷文化、和十八世紀小說》（*Graphic Design, Print Culture,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一書中的第四章，有專章研究李察森如何利用各種印刷排版的印記來達到他的作者意圖。

體小說裡頭的妄想（paranoia）與詭異感，以及這些主題所衍生出來有關於啟蒙以及書信主體倫理的問題，對於未來書信的研究，我們更可更進一步探討那些就像柯麗莎的紙張一般無法投遞的信件，它們的沈默與遺忘又有什麼樣的積極意義。

本論文於2014年4月14日到稿，2015年1月22日通過審查。

引用書目

- Altman, Janet. *Epistolarity: Approaches to a For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Armstrong, Nancy. *How Novels Thin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Barchas, Janine. *Graphic Design, Print Culture,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Beebee, Thomas O. *Epistolary Fiction in Europe 1500 – 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rant, Clare. *Eighteenth-Century Letters and British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Bray, Joe. *The Epistolary Novel: Representations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Burney, Frances. *Evelina*. New York: Norton, 1998.
- Butler, Judith. “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Ed.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 Oxford: Blackwell, 2004. 900-911.
- Castle, Terry. *The Female Thermometer: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Uncan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Masquerade and Civilization: The Carnavalesque in Eighteenth Century Culture and Fic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Chen, Huang-hua. *The Other Enlightenment: Excess and the Epistolary Novel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Dis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009.
- Derrida, Jacques. *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Doody, Margaret Anne. ““A Good Memory is Unpardonable’: Self, Love, and the Irrational Irritation of Memory.”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14. 1 (Oct. 2001): 67-94.
- Eagleton, Terry. *The Rape of Clarissa: Writing, 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 Oxford: Blackwell, 1982.
- Foucault, Michel. “What is an Author?”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 Criticism*. Ed. Vincent B. Leitch. New York: Norton, 2010. 1475 - 1490.

- Freud, Sigmund. "Notes on a Mystic Writing Pad." 1925. Vol. 19.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4 vols. Trans.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1953. 227-32.
- . "The Uncanny." *The Uncanny*. Trans. David McLintock. London: Penguin, 2003. 123-162.
- Habermas, Jürge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rederick G. Lawre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0.
- .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1.
- Howland, John. *Letter Form and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The Epistolary Paradox*. New York: Peter Lang, 1991.
- Jensen, Katherine Ann. *Writing Love: Letters, Women, and the Novel in France, 1605-1776*.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Judgment."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Ed. Hazard Adams. Florida: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92. 376 – 393.
- . "What is Enlightenment?"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Ed. James Schmid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58-64.
- Locke, John.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5.
- Radstone, Susannah and Katharine Hodgkin. "Regimes of Memory: an Introduction." *Memory Cultures: Memory, Subjectivity, and Recognition*. Eds. Susannah Radstone and Katharine Hodgkin.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1-22.
- Richardson, Samuel. *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Ed. Angus Ross. London: Penguin, 1985.
- . *Pamela*. Eds. Thomas Keymer and Alice Wake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Rousseau, Jean-Jacques. *The Confessions*. London: Penguin Group, 1953.
- . *Julie, or the New Heloise: Letters of Two Lovers Who Live in a Small Town at the Foot of the Alps*. Trans. Philip Stewart and Jean Vache.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7.
- Spivak, Gayatri.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ucker, Irene. "Writing Home: *Evelina*, the Epistolary Novel and the Paradox of Property." *ELH*. 60. 2 (Summer 1993): 419-39.

王德威。〈「信」的倫理學〉。《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夏志清編註。台北：聯合文學，2012。392-400。

胡錦媛。〈多層折疊反轉的書信——《捕諜人》〉。鍾慧玲編。《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台北：里仁書局，1997。頁 421-437。

施恩惠。〈通往他者的記憶：保羅・奧斯特自傳《孤獨極其所創造的》中的生成主體〉。《中外文學》42. 2（Jun. 2013）：頁 65-99。

秦曼儀。〈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的出版與閱讀：法國十八世紀女作家與讀者－友人的感性分享〉。《歐美研究》39. 4（Dec. 2009）：頁 769-831。